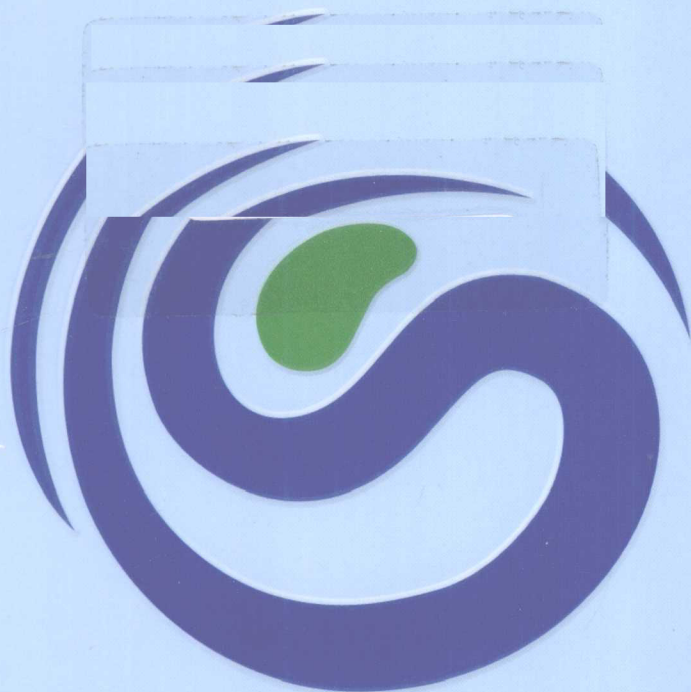


Advance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ume 3)

可持续发展的 新进展

(第3卷)

叶文虎 主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叶文虎 主编

Advance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ume 3)

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

(第3卷)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20 世纪,工业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世界又面临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提出,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认同。它既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战略,其实施取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观、财富观、发展观乃至科学观的转变,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的深刻转变,意味着人类文明阶段的转折与跨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绝不是工业文明的延续,而是建立在“和谐”与“公正”的基础上的人类全新的生存方式,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和与时俱进的。

为此,多年从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中外专家、学者就“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展开了一系列的演讲与讨论,力图使可持续发展思想不断地被深化和丰富。结集出版则是力图引起更多的人在理念、方向和行为上对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和如何转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本书是 2007 年 9~12 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公开课第三期的精彩记录,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第 3 卷 / 叶文虎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3-026827-3

I. 可… II. 叶… III. 可持续发展-研究 IV. X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0177 号

责任编辑:李 敏 王 倩 / 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王 浩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未经本社许可,数字图书馆不得使用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720×1000)

201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插页: 2

印数: 1—2 500 字数: 282 000

定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言

本文集是日本东京海上日动保险株式会社资助的,是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共同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公开课——“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第三年课件的集结。第三年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高度对社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理性思考。这些思考都是专家们多年研究心得的积淀与升华,相信会给读者提供启发。

本文集的内容包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三农”问题、城市化与城乡统筹问题、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经营问题、经济学批判与创新问题、金融问题、环境 NGO 与公众参与问题、国际合作问题等。

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涵盖两个方面: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由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走向、途径、模式的新探索和创建,包括新的理念、新的理论体系、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秩序以及新的技术。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将不断体现在人类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

用历史的眼光看,人类社会运行的方式和秩序,已经经历过若干次重大的转折,相关的理论体系也发生过若干次重大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可持续发展一词的出现标志着又一次转折和转变的开始。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理解为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秩序的话,这就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若干种文明,也出现过多次的文明转折。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工业文明时代,那么可持续发展一词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由工业文明时代向新的文明时代转折的历史时期。这个新的文明时代可称为环境文明时代,也可称为生态文明时代。

对中国而言,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对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但当人类社会转向工业文明时代时,我们却固步自封、裹足不前,错失了“转折”的大好历史时机,以致当世界各国在工业文明时代

大踏步前进时,远远落后下来。200年来,虽有不少“仁人志士”试图扭转这一局面,重振中华,但都收效甚微。

今天,人类社会的文明已经由工业文明向新的文明转折,但中国尚未完成工业文明的历史任务。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必须且只能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将这条道路形象化地表述为“走环境(生态)文明的路,补工业文明的课”。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崎岖不平,困难重重;这是一次新的长征路,我们必须成功。

基于这一认识,也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将进一步争取各方的支持,继续出版“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系列文集,记录下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前进的脚印。恳请读者对前三集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指正,对今后如何编好本文集提出宝贵意见。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叶文虎于北京大学

2009年12月24日

目 录

序言	
讲座一	践行民间 20 年的行动与反思..... 1
讲座二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考 18
讲座三	金融与环境(案例) 29
讲座四	中国当前农村形势和农村可持续发展..... 54
讲座五	企业制度与可持续发展 71
讲座六	可持续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76
讲座七	东芝集团的环境经营(案例) 98
讲座八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基础 123
讲座九	中国新型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 148
讲座十	主流经济学理论批判——清除新发展模式探索的理论羁绊 ... 158
讲座十一	文明演替与经济学创新 178
讲座十二	通过环境问题看中日关系——从形式到实质 199

Contents

Preface

Lecture 1

From the Practic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Chas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	---

Lecture 2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Applying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18
--	----

Lecture 3

Finance and Environment(Cases)	29
--------------------------------------	----

Lecture 4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54
--	----

Lecture 5

Enterprise Syste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71
---	----

Lecture 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Solutions for the 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	76
--	----

Lecture 7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oshiba Group(Cases)	98
--	----

Lecture 8

The Ecological Basi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23
--	-----

Lecture 9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48
---	-----

Lecture 10

A Theoretical Criticism on Mainstream Economics——To Clear the Theoretical Obstacles on the Exploration for the New patterns	
---	--

of Development	158
----------------------	-----

Lecture 11

The Succession fo Human Civilizations and the Innovation in Economics	178
---	-----

Lecture 12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From the Surface to the Essence	199
--	-----

讲座一 践行民间 20 年的行动与反思

主讲人：邓 仪

【主讲人简介】

邓仪，贵州大学环境管理专业大专毕业，贵州师范大学生物科学技术系生物学教学专业研究生班毕业，获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奖学金，北京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

曾组织完成日本环境事业团地球环境基金中国“退耕还林与社区发展项目”评估，独立完成“流动教学车推广”德国米苏尔基金会——中国自然之友的合作项目前期评估，法国 ID 的中国项目进入评估，全权负责日本环境事业团地球环境基金中国“退耕还林与社区发展项目”等 20 余个国际、国内项目。

一、草海——生存与发展共赢

22 年前，我进入贵州的草海保护区工作，那是我环境行动历程中的第一站，作为一个自然保护工作者，我的工作主要是对黑颈鹤、沼泽、湿地、水生动物及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草海是一个高原湿地，是 15 万年前形成的一个高原湖泊，经过千百万年的变迁，一次又一次地从湖泊变成陆地，山洪暴发再度演替为湖泊湿地，历史的沧桑一直这样延续着。到了 1860 年，草海已经是一个水域面积达 45km^2 的高原湿地。到了 1958 年，在“人定胜天”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认为湿地和湖泊没什么用，还是土地好，于是就在当年对草海进行了第一次人工排水，至 1972 年彻底将水排干，排干水的土地归当时的人民公社所有。1980 年，政府政策改变，把那些已经变为土地的湿地承包给当地老百姓。到了 1982 年，国家推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政策，贵州省政府就在草海建立了草海自然保护区。当时在这 45km^2 的保护区中有 14 个行政村，6517 户，27 229 人。

在保护区成立前，这里的土地就已经承包给当地老百姓，因为自然保护需要恢复湖水，当地村民失去绝大部分土地，40% 的农民处于极贫状态下，人均年收入不足 500 元。在关于自然保护区的理论解释中，所有的教材都告诉我们，圆形是最好的保护区形状，长形是如何不好等。保护区中什么叫核心区，什么叫缓冲区，什么叫生产实验区，我们讲究鱼类生态系统的重要，也宣传湿地——“自然之肾”如何调节气候……这些是所有专家、政府和从业工作者审视草海这块土地的思想认识。

但对农民来说,土地是粮食的母亲,因此如何把水排掉让它变成土地,土地上能种粮食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一个保护区内,不同的群体对自然资源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and 价值取向;不同的社会阶层,审视自然的功能和属性时有着本质的差异。

基于两种对自然完全不同的观点,在对自然的运用和价值判断上就出现了冲突。保护区要保护鱼类、鸟类和自然资源;农民要打鸟、捕鱼、排水,生存下去,所以在草海保护区的自然保护进程中突现出了生存与保护的矛盾。保护区域中土地权属是老百姓的承包农地,法律规定30年不变;但1982~1985年才3年国家因为自然保护的需求就蓄水恢复湿地,把老百姓的承包土地大量淹没,因此保护区建立的第一天就注定要发生冲突。当时的我是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很勇敢!所有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我都要制止,制止的方式最初是讲法律法规,说不清楚的时候大家就大打出手。开始的时候还可以,老百姓没有团结起来,抓住一个制裁一个。但毛主席有一句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慢慢的人们懂得了“聚群反抗”,成百上千的农民把我们一个一个“送进”医院。当时在这种打打闹闹过程中,我们用血来保护自然,而另一边农民则同样也是用血来捍卫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对于像我们这样接受多年传统教育的人来讲,作为国家资源的保护者,我们只管保护,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饭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接受的是“怎么堵住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怎么疏导他”的教育。直到有一天,一个基金会来了,不但带了钱给老百姓,还带了钱给保护区,于是我们决定试一试!保护区与老百姓合作的契机就从这儿开始。

首先我们问老百姓:“你为什么要打鸟呢?”老百姓说:“我没饭吃没办法。”其实草海人民祖祖辈辈的传统里面是不打鹤的,因为打一只鹤会遭到报应。当地文化中有一句话叫“人孤孤一时,雁孤孤一世”。你打死了鹤一只配偶的话,它就终生再也没有配偶,而且孤雁特别可怜。老百姓从传统文化里面觉得打死一只鹤是很大的罪过,下一辈子要“下油锅”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人是不打鹤的。后来打是因为“活不下去”。我曾经跟一个农民谈,“你不把环境保护好,未来你的子孙后代怎么办?”那农民很坦诚的告诉我说:“邓老师,我连我这一世都没有了,哪还有下世?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哪能有子孙后代?”这时候你发现,当你试着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时,你会重新去审视自然资源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保护是建立在老百姓贫困基础上的保护,我们开始关注老百姓的发展,去解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于是我们把一些国际的扶贫贷款,即所谓的“小额扶贫款”送给一户一户。让他们在这个基础去做些小生意,当他们能够活下来了,双方再谈环境保护和他们的关系就有了一定的基础。

草海项目我做了9年,9年以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从以前的对立关系发展到了平等的伙伴关系。到2000年,人与自然界基本达到和谐相处,人和黑颈鹤可以近距离相处。

第二,通过这种小额信贷和村寨发展基金等小项目,让老百姓在适当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的同时,还能做些小生意,做点加工,缓解对自然资源依赖的程度。有些项目点(如簸箕湾)的老百姓觉得他们的环境是整个草海最好的,于是他们就把那块地方封起来发展旅游,通过保护来获取利益。

第三,原来是单家独户的老百姓,关起门来过日子,谁家破坏了环境,别人会说“不关我事”。但是,通过项目的运行让老百姓之间产生密切的联系,也就是促进了社区“公共管理机制”的建立。例如,老百姓觉得在鱼的产卵期不应该捕鱼,自发组织村寨间的禁渔协会,规定本村区域的鱼产卵时任何人不得捕鱼,形成每个村分而治之的格局。

草海项目给我的启示是:

第一,当你能够真诚地融入当地人的群体中,去理解他们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去理解他们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找出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结合点,那么这两者是可以共赢的,两者并不矛盾,草海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在可持续发展中,谁是主体?当地人祖祖辈辈依赖着的资源,不管是草场还是湿地,森林还是河流,千百年来他们都生活于此,与之和谐共存。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不和谐?是不是外界的干预使当地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社区自治,老百姓和自然发生交集得以和谐共处。现在是外来强势群体用现代思想去制定他们不理解的区域政策,于是出现了一些像草海一样的事件。所以在可持续发展中,当地人应该是主体,外来者是服务者。

第三,在自然保护中最有效的方式是专职的保护机构还是老百姓?在整个保护区中,保护工作者、专家、学者、领导和当地人民之间,保护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应该怎么分配?草海项目中就有这样的思考。例如,草海簸箕湾项目点,它是草海唯一能有夏天水鸟繁殖的区域,它保护下来意味着新的生命得到延续。而草海另外一边是保护区在管,在这里老百姓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水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最后发现,老百姓受益时保护的有效性与保护区管理的无效性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保护的主体是谁?他的权利义务应该怎么界定?其实草海项目是中国最早将保护与发展结合的探索案例。

第四,资源获取。为了使草海的农民能够继续将环境保护持续下去,2003年推动草海当地的农民和村里的教师成立农民环境保护协会。我被他们选为他们的秘书长,开始写项目建议书申请项目。因为我知道如何按照国际组织的规矩办事,例如,从参与式发展、社会性别、弱势群体等这些概念出发来书写建议书,项目审批下来了,农民们开始不停地做事。后来我因为忙于学习,到全国各地去考察其他区域进行保护项目的调研。再无时间与精力关注农民协会,才8个月的时间农民协会就走入困境:一是没钱了;二是农民和教师发生矛盾了;三是项目资金管理不按

国际标准行事了。当时我反思,这是我的农民协会还是草海农民的农民协会?在中国要让老百姓或者所谓本土化 NGO^① 生存,必须有可依赖的资源,如果资源断掉,将又回到从前。

二、古胜——自我管理实践

2002 年底,我开始介入另一个项目——贵州古胜项目,当时向虎老师在日本上学,要研究中国退耕还林的社会效果,所以整合了日方的资源,在古胜实施退耕还林的 NGO 实践项目。当时有人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有机会能不能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事?恰好项目就在贵州。于是我承担了这个项目。它可以说是在汲取了草海经验教训后的再提升实践,这是我工作历程中的第二级台阶。

对我们国家来说,生态保护越来越重要。长江发大水,国家损失巨大,然后中央提出要退耕还林,恢复生态。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退耕还林据我所知应该是最大的生态工程。在全国范围,它的资金投入量,包括动用的人力、物力应该是最大的。那么做了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结果,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包括我们的领导者。我们选了一个点,在一个已经实施退耕还林的地方来看这一做法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如何用少量的资金做一些深化和本土化的工作,能否完善退耕还林这一大环境运动。

古胜村,位于乌江上游的六广河段,典型的喀斯特地形,行政区域归属于贵州省黔西县素朴镇。喀斯特地形本身为生态脆弱区,且当地进行了多年农耕,石漠化相当严重,也是退耕还林大运动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作为行政村,古胜有 15 个村民组,1918 人,409 户。耕地面积 6.9km²,2002 年为 1605 亩^②。年人均收入为 1100 元。整个村退耕还林面积 2144.2 亩,退耕的户数是 334 户。

对退耕还林又有不同的认识。最初我去项目评估时与当地的林业部门有接触。林业部门的领导很幸福地告诉我,六广河这一带刚好靠近高速公路,当地的规划是:冬天要有绿,春天要有花,秋天要有果。冬天绿是种柏树、藏柏;春天花是种能开花的树;秋天果是要种可以结果的树。领导和学者这一层画了一个香格里拉,一个乌托邦,一定要在退耕还林后达到这个美景,所以他們要种的也是这些树。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呢?老百姓想的是,不管种什么树,反正种一棵树给一棵树的钱,种树多了反而能增加收益。

基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退耕还林的效果就会出现差异:第一,很多树种不适合在喀斯特地区栽种;第二,地退了就是国家退耕还林的地,不是农民自我的

① ①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② 1 亩≈667m²。

事,牲畜怎么破坏都跟农民没关系。这个过程中老百姓“退耕”的积极性很高,因为有国家补贴。喀斯特地区的土地非常贫瘠,每亩地收入远远低于国家补贴,所以人人争取退耕,退不上还得拉关系。但“还林”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种的树是给别人看的,不能直接给村民带来收益。对一个叫熊才华的农民进行访谈时问他:“退耕还林 8 年之后政府不给钱了怎么办?”熊微笑着告诉我:“政府不给钱了,我还是回去种我那块地。”很坦诚的回答,有钱的时候我不种,没钱的时候我再回去种。说到这些“树”,说到“生态”,村民百分之百地会告诉你“他们”、“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政府;说到收益是“我们”。“他们”和“我们”没有结合在一起。

基于这种情况怎么去完善它?这是我工作的第二个历程。老百姓想要什么?仍以退耕还林项目为例。

第一,老百姓觉得如果要真正保护好生态要先修路。如果不往深处想,你不知道一条路和生态保护有什么关系,但深入下去,老百姓会告诉你,如果要种与自己有关系的树,肯定是有经济收益的水果树,但山高坡陡限制了运输,要用五块钱请劳动力把 100 斤^①水果背到能交通运输的地方。否则辛苦种树,收益很小。

第二,村民希望有饮用水。古胜位于乌江河谷两岸,相对河流高程约 100m,但是长期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使他们生活饮水困难。

第三,养殖业和种植业的技术。由于资源的减少,缺乏对自然资源依赖,农民只得寻求新的生产方式,此时技术就是未来生产方式的必然通道。

第四,村民需要得到资金支持。只有在资金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去尝试和开拓适合自己、适合自然的生活方式。

第五,要种自己想种的树,未来发展的选择人应该是自己,只有这几件事情做好了,生态才能实现真正的有效保护。

第六,70%的人保护了,30%的人不保护,环境保护也不可能真正地达到良性的结果。

促使老百姓理解保护与发展的机制,调节人与人、人与社区、村与村的关系,达到保护与发展的共赢。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开始实施项目活动。

第一,沼气。农民的生活薪柴主要依靠砍树,而乌江河谷较湿热,适宜沼气利用。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第二,培训。历史上中国的村落文化都是“听皇帝的”。我走过中国很多地方,看到 50 年前、100 年前甚至几百年前某某县官打了封山碑,下了禁渔令,违反规定的砍树要怎么受刑、捕鱼要怎么坐牢,这是中国文化。如何让村民自己团结起来管好自己的环境,这是需要去探索、践行的。如果只限于通过简单的培训告诉他们“自我管理的可能性”。那么农民的回答永远是:“你是有文化,你能挣钱,我们农民

^① 1 斤=500g。

跟你们不一样。”的确,中国社会阶层的烙印不是马上能改变的,因此只能采取选出村民代表去草海,看草海农民怎么保护自己的环境,在环境保护中如何获得收益。用同阶层上最真实的案例去影响他们,古胜村学习回来的农民马上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的东西,想要用好它,必须先保护好它。

第三,修路把保护的利益与生态的利益更有效地连接在一起。

第四,老百姓没钱用于生产周转,我们做了生态发展的“村寨银行”。老百姓部分出资项目匹配部分资金,几十户集中在一起形成本村的乡村小银行,分期分批借贷再轮流还贷,在利息积累的基础上继续滚动使用。

第五,修水。让村民自我设计,依据各村的自然条件,建设适合自己的饮水工程。

第六,老百姓要种自己的树苗圃。老百姓要获得技能,项目出资请当地农业局、牧业局的技术人员、专家给老百姓培训。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老百姓按照他们的意愿产生了组织形式,哪些人怎么做,谁家出多少钱,谁来购买材料,谁是管理者,管理不好该怎么对待他……按照当地的文化形态和风俗习惯形成一个他们自己执行的项目实施计划。

例如,修路怎么修,谁家修多少,不修的怎么样。有这样一个事件:全村人参加修路时,有一家当众说“我家不走,我不修”。最后全村开了一个村民大会,项目工作者旁听,没有发言权。会上全村人决定,他家不参加修路可以,从今天开始他家以及他家的后代子孙只能用脚走这条路,但不能用车运东西,全村男女老少任何人看见(车运)都有权制止。结果修路后第二年村里电网改造架电线,其他人家的电杆承包到户后都是用车运进去,他家的(电杆)拉到路口后,“对不起,卸下来,请人搬进去”。修路的过程比较复杂,路修成后当地镇长说,如果政府来修,10万块钱都修不了,因为仅赔偿修路占用农民土地的钱就赔不起。而老百姓自己修路时,智慧地通过调地,把这一关键问题轻松地就解决了。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非常精彩的案例,蕴涵着它的文化现象和权利结构。

古胜项目和草海对各自的影响不同。在草海9年中,是一些像我一样接受了国外NGO项目运作方式训练的学者带领着人民做项目。而在古胜任何一个项目该怎么做,全是由村民来评判。15个村民组拿出他们的项目竞争方案,然后15个村民代表不记名打分的时候,最高分的拿项目,低分的下次再参加竞争。资金的使用权全在农民身上,项目工作者只是一个促进者和监督者,这就是项目主体的根本变化。

2002~2007年,在古胜村项目完成了:第一,老百姓自己在没有国家一分钱补贴下主动封山保护山林13000多亩,他们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每个人在神龛前面按下手印,如果失去诺言要受神的惩罚,他们接受这样的方式。在这13000多亩封山区域,村民种了核桃树、板栗树、柿子树、苦丁茶等,按照老百姓预计每年有15万~20万元的收益。除了老百姓的分红外,每年有5万~10万元公益资金(项

目资金)投入产生的利润。此时,其实项目建议书就没有意义了。它真正依赖的资源是用自身能力进行自我“造血”产生集体资金。第二,通过修路、修水、封山育林等项目实施形成一个规则。按照发展学概念称为“社区组织能力”,按照传统的说法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监督机制。项目前这个地方与政府关系不太好,镇长的车差点被他们砸掉。项目实施3年后,有一天政府分管退耕还林的镇长下乡,看见树林旁边有一个老头在烤火。镇长很不高兴地说:“别在这生火,容易发生火灾。”老头站起来告诉他说:“发生什么火灾?我就是看树林的。”镇长很奇怪:“看啥树林?”老头说:“今天轮到我们家看啊,我们村已经制定了树林管理的制度,今天轮到我们家看守值班。”政府干部对我说:“我们从来没敢想过村民会这么做,我们总是防止他们不砍树,没想到他们会自己管护,而且一家一户轮着,谁也不准进去。”在这过程中,政府在很多事情上都被感动了,后来也投入一些物资支持。

贵州古胜老百姓自我保护、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案例为全国很多其他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项目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2004年开始,古胜15个村民组,每组选出3名代表称为小管理委员会;45个人中再选出5人组成全村的项目管理委员会,形成自己的管理机制。2006年正式注册成立“古胜农民生态产业协会”,选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每年一任,一任一选。现在,项目人员已经退出,但村民的自我管理机制已经在做事的过程中形成。

在这个项目里,我个人的反思是:

第一,项目主体的体现。用钱、管钱、审钱的所有权利都在老百姓手中。举例,第一个修路项目,项目出80%,农民只出20%,后来所有项目资金移交给大管理委员会后,慢慢变成7:3、6:4、5:5……最后1:9,老百姓出9,项目方出1。慢慢变成他在做事你在帮他,逐渐退出,我不帮,人家也在做事。

第二,种板栗、核桃、柿子的项目,是集资入股机制。有经济股、有农家肥股、锄草也算股,不同生产习惯用股份形式集中起来。因为果树成熟要5~8年,收益怎样还需时间检验,所以还是个雏形。

第三,与政府的对接不够。社会主义新农村项目也在古胜实施了,但很可笑。在当年项目花了12000元修的路上,政府请一个包工队花了28万元加铺了一层水泥。如果当时项目与政府的接口再稳一些,这28万元不知能修多少条更有意义的道路,而不是去变成水泥。虽然古胜农民协会的人会跑到省农业厅要点养鸡苗,也会跑到地区农牧局要一些科技图书,已经和当地农民不一样,但是与政府对接的能力和方向仍欠缺。

第四,与市场、商业的接轨欠缺。现在的古胜有大量旅游公司修建度假村。但农民协会与这一需求是脱开的。

这是我工作中的第二个历程——古胜项目。

三、阿拉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式发展”探索

2004年有一个机会带我走上人生第三级台阶,中国有一群企业家突然在情人节晚上“集体感情出轨”(企业家自嘲),觉得现在有钱了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做什么事呢?做生态保护,因为北京沙尘暴太大,能不能在沙尘暴的源头种草种树。在当时企业家的理念中,环保就是种草种树。于是2004年3月15日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的企业家要在阿拉善做环保,种草种树,让我帮他们一下。之前我和中国企业家没有打过交道,中国NGO里面流传着一种思想影响我很深:第一,政府没好好做事;第二,有钱人做事只是为了他们未来的商业利益。因为有钱人在获得资本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压力比其他的群体要多得多,NGO开大会时经常会在泪水和控诉中演绎,我耳濡目染时间长了也觉得有些道理。所以我原本无缘去做这样的项目,也没有这样的意愿,但一个特别的朋友出面让我帮他私人的忙,并达成共识,希望我能去按自己的专业和工作经验把这个新组织往正路上引,朋友认为这样就是做点好事,不去的话,他们可能要走弯路。于是我承诺做两个月的志愿者。2004年3月28日我去了内蒙古阿拉善,那个时候我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协会)。SEE是企业家自己设计的,S是社会(society),第一个E是企业家(entrepreneur),第二个E是生态(ecology)。企业家站在中间挑着两个担子:社会责任与生态责任。

前期进行了调研工作,我写了一些对协会未来方向的建议书。6月5日世界环境日协会正式成立。阿拉善的环境问题分两个层面:自然的因素,如全球气候变暖等大气候的影响,自然因素是人为不可改变的;另外一个因素即是认为对自然的破坏,是可以通过对作用于自然的群体的改善,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于这种的判断,我们首先得知道阿拉善环境问题更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

第一,不适合的生产方式介入干旱的荒漠草原生态系统,阿拉善属荒漠化草原,年降水量仅为30~200mm。20世纪70年代受“牧民不吃亏心粮”政策和“人定胜天,誓向沙漠要粮田”的政治思想影响,政策导向提出让牧民种地的要求,但这里种地没有天然降水,只能依靠大量抽取地下水。

第二,随着历史变迁、文化冲击,原来居民拥有的对自然敬畏的文化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对自然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当地的历史上,砍一棵活的树是要受处罚的,道德上也是不允许的。但后来文化的变迁以及外来者的进入,砍树的人多了,当地人想你们都砍完了,我再不砍一点也不行了。文化的变迁导致自然生态受到了冲击。

第三,阿拉善地区得到中央、地方政府的很多支持,但保护思想却很单一,这种治标的保护工程项目,遵循了一个快餐式的保护逻辑,认为沙尘暴是因为地表植被

消失了,植被消失了就要种树。大家坐在办公室,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出来了。例如,在“三北防护林”的区域之一就能明显地看到,大树是长高了,而小树和草本植物就缺水而枯死;再过一段时间,大树也因为地下水的下降而死掉。这是因为杨树等其他树种在当地称为“抽水机”,树不断长大,却得不到降水补给,完全依靠吸取地下水,大树树根把地表水吸掉,小树和草就死掉;再往下吸不到水时,大树也死掉。

第四,是近年来众所周知的“围封转移”保护战略,整个西北、青藏高原,只要有草场的地方都在拼命围。工程的假设是有铁丝网围好就能让草场恢复,但在阿拉善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的自然状况,被围封起来的梭梭林,羊和骆驼的确是进不去,正因为这样,老鼠很快地得到繁殖,要生存,老鼠就得在梭梭树下打洞,把成百上千亩的梭梭树枯死。其实道理很简单,骆驼吃梭梭但不会过度啃食,它把周围吃了一圈,梭梭会往处长。而且骆驼吃梭梭时,吃一口走三步,不断走动。骆驼的庞大体重踩在沙漠上会踩塌鼠洞,这样的结果是老鼠重新建筑巢穴就能制约它的繁殖量,所以老鼠和骆驼关系就是一个平衡。现在骆驼进不去了,没有了制衡,老鼠也就平安地生儿育女,形成了鼠害。自然不是文字故事,故事可以按照作者的创意去编造,生态结构是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自然很博大,远远超越了短视的人类判断,很多的生态问题至今人类尚未真正地了解。老子说,道法自然,也就是提示我们做事应该遵循自然规律。所以说单一的保护行动有时候也是一种破坏。

基于这种现状,作为一个 NGO 工作者,面临政治和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20 世纪 50 年代阿拉善只有 3 万人,现在增加到了 20 万人,人口的改变不是 NGO 所能控制的,历史不该种地的地方种地了,这种历史也不是 NGO 就能改变的,我们能改变的是当地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通过 NGO 的组织方式、资金方式去影响和促进当地老百姓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适合于自然规律。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定位必须是清晰的,清晰就是通过实践的过程,综合提升再付诸实践的循环往复。在草海的实践我们发现,老百姓依赖资源事实证明是有偏差的,而古胜项目缺乏了与政府、市场的结合。只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才能清晰地认识到 SEE 协会是政府体系外的完善、补充力量,当然也不能冒充上帝去改变社会的一切,而是在政府和当地老百姓愿意所做的事情上去完善和补充。

选择具有环境代表性区域,通过具体的实践促进自然发生变量。例如,梭梭林区域、胡杨林区域、搬迁的农区区域、地下水过量开采的区域……通过自然项目去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途径,产生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将一些环保理念、工作方法和政府的工作规则结合起来,然后结合商业的、政府的资源一起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的定位。

阿拉善 27 万 km^2 的面积只有人口 20 万,人均区域面积 1km^2 还多,这在国内